

中等强国专题

中等强国兴衰的经验启示： 以阿根廷为案例*

孙洪波

内容提要：阿根廷在世界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发展历程，“奥尔森命题”“布罗代尔钟罩”等分析视角对阿根廷的兴衰有着较强的解释力。阿根廷历史上的经济繁荣，主要是由耕地扩张、吸引欧洲移民以及对英国贸易依赖等要素驱动下的斯密型增长，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阿根廷未能实现向创新驱动的熊彼特型增长转型。从阿根廷独立后百年兴衰历史进程看，殖民遗产的路径依赖、地产寡头与农业立国、英帝国繁荣带来的斯密型增长、分利集团与食利型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与资源租金枯竭、金本位及美元霸权与国家信用透支、农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的结盟或对抗，大致可刻画出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历史逻辑。本文将“阿根廷之谜”归结为中等强国兴衰规律的一个独特案例，将阿根廷的衰落现象界定为公共产品博弈困局。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历史教训，从公共产品博弈角度看，主要体现在政治、金融、产业转型、外交等功能领域的公共产品供需严重失衡，未能充分满足国家崛起和发展转型对公共产品的客观需求。阿根廷曾作为新兴国家崛起，因国家能力有限，长期依赖霸权国在贸易、汇率、融资等功能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对霸权国依赖的敏感性、脆弱性严重制约了阿根廷的战略自主。结果在国际体系转型中，阿根廷一直面临着路径依赖、对外战略调整压力以及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协调的多重困境。

关键词：中等强国 奥尔森命题 公共产品 资源租金 国际体系 制度悖论

作者简介：孙洪波，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展与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4)03-0098-20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3ZKJC11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拉美区域国别研究项目（编号：DF2023ZD31）、中国社会科学院—阿根廷科技部联合虚拟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阿根廷是拉美地区大国、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19世纪末阿根廷总统佩列格里尼（Carlos Pellegrini）指出，“我们国家的理想是，明天的阿根廷将会像美国的今天这样，也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审视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和方式，也要看到阻隔我们实现理想的距离。”^①国家的兴衰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的问题，阿根廷曾对未来的发展怀有无限美好的憧憬，但国家的梦想并未如愿以偿，学界普遍将这一问题称之为“阿根廷之谜”^②。

阿根廷在世界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曾一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受内外因素影响，阿根廷未能把握住历史机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致发展水平长期停滞，被认为是唯一从发达国家衰落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案例。国际学界提出“阿根廷之谜”一说，将阿根廷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阿根廷官方及有关权威智库专家虽不认同“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提法，但也承认阿根廷在发展道路探索和国家治理建设上遇到了严重挫折。

阿根廷作为中等强国的兴衰之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学术命题。阿根廷资源禀赋优势突出，人口大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国际学界普遍将其视为当时具有潜力、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可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相类比^③。库兹涅茨、萨缪尔森、刘易斯等经济学家都曾评述过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现象，探讨阿根廷国家兴衰的经济逻辑。阿根廷的兴衰现象让国际学术界困惑了数十年，对“阿根廷之谜”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概念、学术命题以及论证逻辑，主要有“阿根廷问题”“阿根廷发展之谜”“阿根廷悖论”等多种提法。^④对阿根廷的认识或印象普遍有一种历史错觉抑或悲情式的历史解读。本文在评述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研究文献基础上，尝试运用公共产品博弈分析框架研究“阿根廷之谜”现象。

① Guido Di Tella and D. C. M. Pla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1880-194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86, p. 122.

② [美] 乔纳森·C. 布朗著，左晓园译：《阿根廷》，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页。

③ [阿根廷] 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著，候健、张琼译：《阿根廷迷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66页。

④ Carlos H. Waisman,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8.

一 文献评述

中等强国理论是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倡导的，是对中等强国的身份界定、行为特征、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总结或归纳。中等强国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欧洲有关均势理论中，是指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国家类型，二战后通常指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并涵盖了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地区大国^①。有关“中等国家”的定义、类型、地位等一直存在争议^②，普遍认为中等强国在国际等级结构中位于中间以上位置，具有中等规模的实力资源，与中等国家、新兴国家以及地区强国等概念有交集。墨西哥学者冈萨雷斯认为，中等强国指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世界力量格局中居于中间地位的国家，可调动其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③。根据权力结构的等级制原则，阿根廷凭借其国际地位及地区影响力，同巴西、墨西哥并列为拉美的中等强国^④。把中等国家的实力、独立性与国际环境联系起来，按照功能主义，中等强国具有相当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阿根廷是一个有着重要地区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它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除了维护国家利益外，还与其对自身在全球和地区的角色定位有关。^⑤

阿根廷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外界普遍将其视为中等强国。由于综合国力衰落以及目前受到主权债务、金融动荡等问题牵绊，阿根廷的中等强国地位遭受了诸多质疑。联合国成立初期，欧洲的荷兰、波兰，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均被视为中等强国；阿根廷在国际冲突协调、粮食安全等诸多功能领域都扮演着中等强国的角色^⑥。二战结

^① Andrew F. Cooper, Brian Hocking, and William Maley (eds.), *Global Governance and Diplomacy: Worlds Apar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p. 285.

^② 潘迎春：《“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第119-123页；唐纲：《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8期，第40-48页。

^③ [墨] G. 冈萨雷斯：《何谓“中等强国”？》，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第43-44页。

^④ Carsten Holbraad, *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92-107.

^⑤ 赵重阳：《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与实践效果——以阿根廷为例》，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8-23页。

^⑥ G. de T. Glazebrook, “The Middle Power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 No. 2, 1947, pp. 307-315.

束至 20 世纪 70 年代，阿根廷尚能保持着中等强国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马岛战争使阿根廷中等强国地位受到严重打击，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下取得的经济增长使得阿根廷综合实力有一定恢复，但 2001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度导致阿根廷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2022 年兰德公司对全球中等强国的评估指出，阿根廷的分量下降，而巴西、墨西哥的权重明显上升；包括拉美地区大国在内的中等强国普遍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且已成为推动跨区域合作的主要新兴力量。^①

欧美学者主要从国家兴衰角度，聚焦研究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特点，并将其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比较。库兹涅茨使用“演化”而不是“增长”“发展”概念描述阿根廷兴衰现象，认为阿根廷、日本是不能用经济理论解释的案例^②。刘易斯将阿根廷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进行比较，认为尽管阿根廷拥有资源禀赋的发展优势，但该国经济与同期新兴国家相比出现了惊人的“倒退”现象^③。沃尔特·罗斯托认为，阿根廷仅仅于一战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进入起飞边缘阶段，但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过快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约束条件的不利影响，阿根廷经济未能成功起飞。^④卡多佐认为，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阿根廷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在国内市场规模、工业发展基础、外汇盈余积累、国内资本形成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阿根廷为何没有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或质变，已有经济理论未能给出充分解释^⑤。

从制度经济学研究文献看，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主要是由耕地扩张、吸引欧洲移民及对英贸易等要素驱动下的斯密型增长，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并没有实现向创新驱动的熊彼特型增长转型。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是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相互作用的现代经济增长。^⑥从

^① Michael J. Mazarr, Jonah Blank, and Samuel Charap, *Understanding the Emerging Era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Santa Monica, Calif.: The RAND Corporation, 2022.

^② Carlos H. Waisman,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

^③ W. Arthur Lewis,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1913*,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195-197.

^④ W. W. Rostow, "The Take-off into Self-Sustained Growth", i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66, No. 261, March 1956, pp. 25-48.

^⑤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Faletto Enz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3-6.

^⑥ 韦森：《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载林毅夫著：《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9-83 页。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相互关联的研究视角探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布罗代尔钟罩”是指那些阻碍“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①，有“制度规锁”或“制度僵化”之意，对解释“阿根廷之谜”很有启发性。诺斯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是所有权重建的结果，失败的国家如西方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②，由此产生了“英国—北美”路径和“西班牙—拉美”路径之间差异的学术讨论。“奥尔森命题”对阿根廷的兴衰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阿根廷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美国，它们后来的国运和成就大相径庭，根据奥尔森命题^③，“阿根廷之谜”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僵化症”或者说“制度悖论”导致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1860—1914年间，阿根廷经历了约50年的经济增长，是汲取型制度下的增长案例，因缺乏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④。上述大部分制度经济学研究文献中都包含了理性合成谬误、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或称之为“奥尔森困境”的学理分析。

有关“阿根廷之谜”的“库茨涅兹之问”虽广为众多学者引用，但尚缺乏明确的文献出处。威斯曼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曾在学术研讨会上听到库茨涅兹对阿根廷发展之谜的学术评论^⑤。一些学者研究明显有着意识形态倾向，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研究“阿根廷之谜”，以此提出自己的学术假设，认为阿根廷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出现了差错，阿根廷今天的现状与历史上的发展潜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并不匹配。阿根廷学者拉波波特认为，“阿根廷衰落”不应归因于农产品出口模式的终结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恰恰相反，其正是军政府和梅内姆政府时期放弃工业化并实施经济开放、自由化政策的结果。^⑥

^① 韦森：《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载《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第5—21页。

^② [美] 格拉斯·C. 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197页。

^③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第11—14页。

^④ [美]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第289—290页。

^⑤ Carlos H. Waisman,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8.

^⑥ Mario Rapoport,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Argentina: Desde la Formación Nacional Hasta Nuestros Días*, Buenos Aires: Capital Interlectual S. A, 2017, pp. 50—52.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开始加大对“阿根廷之谜”的研究力度。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劳尔·普雷维什^①、阿尔多·费雷尔^②、吉多·迪特雅等对阿根廷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③，以及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对阿根廷经济史的深入研究^④。依附论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使用“欠发达”概念解释“阿根廷之谜”，将其视为国际经济依附的典型案例，强调阿根廷对外国投资、外汇及技术的高度依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⑤。阿根廷作为技术进口国，难以实现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熊彼特型增长。在马岛战争、债务危机及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阿根廷之谜”研究的高峰期^⑥，对阿根廷发展历史转折点的分析以及对阿根廷衰落机制的研究，都存在不少学术分歧^⑦。多数学者注重对阿根廷衰退现象的经济指标描述，但在数据来源方面多有争议。

从外交政策角度看，拉美自主性理论认为，外围国家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的回旋空间，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可摆脱对中心国家

① Raul Prebisch, et al., *El Desarrollo Economico de la Argentina*, ECLA, Santiago, Chile, 1958.

② Aldo Ferrer, *The Argentine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③ Guido Di Tella y Manuel Zymelman, *Las Etapas del Desarrollo Economico Argentino*, Buenos Aires: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de Buenos Aires, 1967.

④ Carlos F. Diaz Alejandro,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⑤ Francisco C. Secovich, “Dependencia Tecnológica en la Industria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omico*, No. 14, April – June 1974, pp. 33 – 67; Jorge M. Katz, “Industrial Growth, Royalty Payments and Local Expenditure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Victor L. Urquidi and Rosemary Thorp (eds.), *Latin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3, pp. 197 – 224.

⑥ Albert Hirschman,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93; Guillermo O’Donnell,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Argentina, 1966 – 197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Guido Di Tella and Rudiger Dornbusc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1946 – 1983*,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 Luigi Manzetti,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rgentine Riddle Reconsidered”,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9, No. 2, Summer 1994, pp. 82 – 114; Paul H. Lewis, *The Crisis of Argentine Capit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William C. Smith,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ouglas M. Richmond, *Carlos Pellegrini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Elites, 1880 – 1916*, New York: Praeger, 1989.

⑦ Luigi Manzetti,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rgentine Riddle Reconsidered”,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9, No. 2, Summer 1994, pp. 82 – 114.

的依附,实现自主发展^①,主要以胡安·卡洛斯·普伊格等阿根廷学者关于“自主性原则”或“自主性理论”为代表。^②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外交的主要思想,主张冷战后跟随美国霸权,希望在公共产品上能够“搭便车”。^③埃斯库德主张阿根廷同霸权结盟的政策路线,对自主性思想提出了批评,认为自主性会导致阿根廷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境地,而且阿根廷没有必要同霸权国产生分歧或同其爆发冲突。以拉波波特为代表的社会—历史主义,使用了异质的自主性概念对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阐释。

国内学者有关阿根廷兴衰现象的研究成果较多^④。“阿根廷之谜”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其从20世纪初期的“希望之邦”逐步沦落为一个相对贫困、落后的“衰败国家”^⑤;对阿根廷社会性质、庇隆主义、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研究有助于解答“阿根廷之谜”^⑥。1955年军事政变后,阿根廷陷入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长期斗争的局面,也在威权主义与民众主义之间的摇摆中逐渐沦落为一个“衰败国家”。“阿根廷之谜”在于其特殊的阶级结构,可用

① 赵晖:《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理论及其评价》,载《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22页。

② José Briceño Ruiz y Alejandro Simonoff, “La Escuela de la Autonomía, América Latina y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49, No. 186, 2017, pp. 57-58.

③ Carlos Escude y Gran Bretaña, *Estados Unidos y la Declinación Argentina, 1942-1949*, Buenos Aires: Belgrano, 1983; Carlos Escude, “Réplica al Comentario Sobre La Declinación Argentina”,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No. 52, 1984, pp. 630-636; Carlos Escudi, *Realismo Periférico: Fundamentos para la Nueva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2; Carlos Escudi, *El Realismo de los Estados Débiles: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l Primer Gobierno Menem Frente a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Buenos Aires: GEL, 1995.

④ 徐文渊、陈舜英、刘德编:《阿根廷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舜英:《阿根廷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载《拉丁美洲研究》,1984年第6期;江时学:《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其教训——兼论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江时学主编:《阿根廷危机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沈安著:《阿根廷危机的回顾与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董国辉:《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房连泉:《庇隆时期的社会政策——兼论阿根廷福利民粹主义传统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姜涵著:《制度选择与钟摆式发展——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高庆波、芦思姮:《阿根廷经济迷局:增长要素与制度之失——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探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第86-100页;高庆波:《阿根廷债务危机:起源、趋势与展望》,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第92-105页。

⑤ 董国辉:《学术史视野中的“阿根廷之谜”》,载《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七辑),2010年12月,第261-274页。

⑥ 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制度失败”解释，阿根廷特殊的初始资源禀赋使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结构，强大的农牧业利益集团与劳工集团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加之多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加深了利益分化和分配冲突的复杂性。各时期的阿根廷政府被特定集团所俘获，掌控政权的特定利益集团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其发展战略与整个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不符合，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是“非生产性的”，结果导致该国经济沦为政治的牺牲品。^①

二 本研究的主要思路及框架设计

对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解答，不能仅依靠技术性指标或某一领域专业研究，还需要跨学科、跨时段、跨国别的综合性比较研究，以避免孤立、断裂或片面地分析“阿根廷之谜”，这在客观上需要将学理逻辑与历史逻辑相契合。本文将“阿根廷之谜”归结为中等强国兴衰规律的一个案例，将阿根廷的衰落现象界定为公共产品博弈困局或失败情景。根据成本—收益分担机制以及受益范围的不同，公共产品可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集体物品、区域性或全球公共产品等类别。考虑到公共产品理论尚有不少学术争议，本文不对该理论做纯粹的学理探讨，主要借用有学术共识的概念、逻辑及分析思路对“阿根廷之谜”进行解释。本文也尝试突破以国家为研究中心的局限性，从国别层面的公共产品看阿根廷国家能力建设面临的公共产品透支或赤字难题，进一步拓展到分析区域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对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影响。

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从国内、区域及国际三个维度，紧扣公共产品供需动力机制，研究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演变规律，既分析阿根廷国别案例的特殊性，也分析该案例可能蕴含的一般规律。从阿根廷独立后百年兴衰历史进程看，殖民遗产的路径依赖、地产寡头与农牧业立国、英帝国繁荣带来的“斯密型增长”、分利集团与食利型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与资源租金枯竭、金本位及美元霸权与国家信用透支、农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的结盟与对抗，大致可以刻画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历史逻辑。或者说，“阿根廷之谜”内含的逻辑矛盾是财政资源、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的枯竭，背后的原因则是制度规锁、制度僵化或制度悖论。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① 吕芳著：《制度选择与国家的衰落》，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7页。

至少是起着主要和根本性作用，但由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利益集团博弈、制度非中性及路径依赖等原因，实践中会出现制度悖论。^①

首先，从国内公共产品维度看，阿根廷面临公共产品博弈困境。赫希曼是最早指出公共产品在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学者之一，他将诸如交通、医疗保健、通信系统、公用设施和其他形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界定为社会分摊资本。^② 经济学家有关国家理论的共识认为，国家只是组织的一个特殊形态，旨在提供共同利益或为大众谋福利。^③ 萨缪尔森有关公共产品的论述为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建立了内在的连贯逻辑，布坎南将其称之为“生产性国家”的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存在可以看作市场失灵的极端形式，是政府干预的关键因素^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概念之间既有交集，亦有不一致的地方，公共产品是人类社会解决外部性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方案。外部性是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⑤。萨缪尔森认为，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同不完全竞争、公共产品列为非效率的三种情景，而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则是公共产品。^⑥ 不同党派产生或形成公共产品或外部性的效率差异，对公共政策有决定意义。^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公共产品理论强调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无论是旨在保护产权的制度，还是富有效率的财政、税收或金融制度，其实施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⑧，这是一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前提。阿根廷独立后几十年里陷入内战，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导致国家独立半个世纪之久仍未建立一个正常运

① 张宇燕著：《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3-212页。

② Albert O.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③ [美]曼瑟·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年，第117-127页。

④ [美]詹姆斯·布坎南著，马珺译：《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⑤ 张宇燕著：《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⑥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译：《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4-58页。

⑦ [美]曼瑟·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年，第204-207页。

⑧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第42-69页。

转的政权^①。阿根廷作为移民国家，是“先有国、后有民”。阿根廷人被认为是“从船上来的”，阿根廷民族也是一个存在实体，随着国家建构的逐步完善，其民族认同也在逐步发展。^②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国家构建过程中还面临着军队、财权、货币统一问题，涉及国家诸多功能的“组织化”建设。

其次，国际性公共产品博弈对阿根廷兴衰有着重大影响。吉尔平认为，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一个或多个领导国提供稳定的国际货币、促进自由贸易，确立国际贸易公平和中立规则，制定和执行关于贸易管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规则，且以主要经济大国的合作为基础。^③阿根廷独立是西班牙殖民体系解体的结果，亦是拉美地区的国家构建、主权国家体系形成的过程。阿根廷作为新兴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全球大国兴衰及权力中心转移的历史进程，涉及国际贸易、货币、金融等领域的公共产品供应者更替问题。国际性公共产品供应的难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或政治机制进行合理的配置，由于任何国家投资的边际成本都会远远低于全球的边际收益，投资不足是必然的结果^④。21世纪初，世界银行的贷款更多地转向支持包括传染病防治、环境保护、贸易与金融稳定等在内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应^⑤。金德尔伯格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界定包括了和平、航海自由、清晰的产权界定、计量标准、固定汇率制度等方面，他将1933年阿根廷被迫同英国为解决双边支付问题而签署的《罗加—朗西曼协定》作为双边类公共产品特殊案例，将其区别于国内公共产品的自利行为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范式。^⑥阿根廷发展历史进程经历了几轮国际体系转型，迫于霸权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变化情景，它一直面临着路径依赖、对外战略转型压力以及国内政治协调的困境。

最后，阿根廷是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贡献者。本文对中等强国

① [美] 戴维·S. 兰德斯著：《国富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45页。

② 袁梦琪：《成为阿根廷人：阿根廷移民与社会整合政策》，载《史林》，2023年第5期，第16-20页。

③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④ [美]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译：《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54-455页。

⑤ 金立群、[英] 尼古拉斯·斯特恩编著：《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⑥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13.

的界定强调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可划归多个功能领域或维度加以评估。按照功能性原则，中等强国扮演着强互惠者角色，发挥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或特定功能领域公共产品的功能^①。结构性权力是一国决定国际惯例和规则的权力^②，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阿根廷结构性权力相对有限，多限于特定功能领域和南美次区域内。阿根廷在崛起过程中对国际规则的完善有着重要贡献，如提出的卡尔沃主义反对滥用外交保护、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德拉戈主义确立了债权国不能使用武力逼迫债务国偿还债务的原则^③。从国际和区域组织角度看，阿根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多边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等强国希望主要“节点”大国的行为可预测，小国的行为能够尊重现有秩序以及中等强国的地区实力优势，区域关系模式符合“霸权国—中等强国—小国”的三角关系^④。后霸权世界格局中存在着互惠的非霸权秩序，任何“后院”都不再有围墙，中等强国因更可预测的秩序而获益，拉美国家广泛拥有美国无法控制的全球关系选择^⑤。中等强国地位赋予阿根廷诸多功能性权力，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南极治理、拉美一体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历史演变

阿根廷靠农业立国，农牧业繁荣奠定了其中等强国地位。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作为依靠农产品出口收益崛起的新兴国家，其现代意义上的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集中在港口、铁路、教育、医疗等领域；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应看，阿根廷在不干涉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国家主权等全球治理规范方面有着重要贡献^⑥。伴随英国特惠制贸易政策的出台、阿根

^① Adam Chapnick, “The Canadian Middle Power Myth”,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5, No. 2, 2000, pp. 188–206.

^② [英] 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29页。

^③ Eduardo Devés y Silvia T. Álvarez, *Problemáticas Internacionales y Mundiales desde el Pensamiento Latinoamericano: Teorías, Escuelas, Conceptos, Doctrinas, Figuras*, Santiago de Chile: Ariadna Ediciones, agosto 2020, pp. 207–234.

^{④⑤} [美] 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李晓燕、薛晓芃译：《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03页，第181–198页。

^⑥ 单文华、张生：《从“南北矛盾”到“公私冲突”：卡尔沃主义的复苏与国际投资法的新视野》，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17页；韩秀丽：《再论卡尔沃主义的复活——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视角》，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121–136页。

廷国内政局动荡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生性缺陷，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阿根廷中等强国地位进入徘徊甚至衰退期。时至今日，阿根廷仍处于重塑其中等强国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中等强国地位的奠基时期（约1820—1880年）。阿根廷独立后，多年陷入地方武装割据局面，各地方政权就国家采用联邦制或集权制问题而发生激烈斗争。随着英国不断崛起，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向法、德、意等国不断扩散，欧洲对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阿根廷皮革、羊毛等畜牧产品对欧出口利润丰厚。受强烈的土地利益驱动，阿根廷考迪罗政府进行了多次荒漠远征，抢占土著印第安人大量土地；同时，阿根廷联合巴西、乌拉圭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最终实现了以潘帕斯草原为中心的土地扩张，占领了南至巴哥塔尼亚地区、北至查科地区的广袤疆域，为阿根廷农牧业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潘帕斯草原是天然宜于开垦的，甚至仅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能够连年得到丰收^①。阿根廷广阔的国土适合于现代化农业，农牧产品的生产成本也较为低廉^②。这一时期，阿根廷国土疆域基本完成统一，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得以沿袭，地产阶级势力扩大，土地租赁市场开始发育，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前来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对外贸易的利润不断刺激阿根廷养牛业、牧场扩张。

第二阶段：中等强国地位的形成时期（1880—1930年）。19世纪后半叶，阿根廷依靠农牧业繁荣顺利晋升为世界主要经济体。1890年，阿根廷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六，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20世纪初，得益于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城市化步伐加快等有利因素，阿根廷迎来农业出口繁荣、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综合国力达到历史高峰。1870—1913年间，阿根廷跻身世界出口五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6.02%，人均收入高于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③。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300多万移民不仅解决了阿根廷农牧业劳动力短缺难题，而且带动了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该国铁路里程从500多千米陡增至逾3万多千米^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除战争初期外，阿根廷农牧产品的出口持续增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牧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4页。

③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④ 董国辉：《阿根廷：出口繁荣、庇隆主义与“衰败国家”》，载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0—223页。

品出口国。1915—1919年间，阿根廷年均出口牛肉41.6万吨，小麦240.5万吨，玉米225万吨^①。1916—1930年间，阿根廷政府实行鼓励发展民族工业、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食品、纺织等轻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重工业发展较为薄弱。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经济增速甚至超过了许多工业化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超过了6.7%。这一时期该国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兴起^②。外交上，阿根廷优先发展对英国的关系，吸引了大量英国投资和贷款参与农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由于同美国有激烈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关系，阿根廷农业利益集团排斥发展对美关系。

第三阶段：中等强国地位的徘徊和衰落时期（1930—1982年）。这一阶段是阿根廷农业繁荣衰退与发展模式转型阶段。伴随大萧条在欧美不断蔓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农牧业出口大国兴起，阿根廷农业出口不断遭遇外部竞争压力。在此背景下，加之受二战爆发、经济民族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思潮的影响，阿根廷开启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主要以“剪刀差”形式以农支工，通过价格、汇率、补贴等政策手段，用农业资源扶持工业部门扩张。特别是庇隆总统执政期间，阿根廷建立起门类齐全、相对发达的工业体系。这一阶段，阿根廷石油、化工、汽车等工业开始兴起，而农牧业比较优势未受到应有重视。至20世纪70年代末，阿根廷建立了包括食品、纺织、制糖、酿酒等传统轻工业，钢铁、冶金、电力化工、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汽车、机床、造船、飞机、电器等制造业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甚至发展了卫星、核能等领域^③。庇隆主义制度下阿根廷国有经济比重不断扩大、劳工运动兴起，使该国形成了高福利政策传统。然而，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危机显现，阿根廷被迫走上了负债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及2001年金融危机，使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受挫，国家士气和凝聚力亦受到相当损耗。总体看，阿根廷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未能妥当应对债务和金融危机，使阿根廷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第四阶段：中等强国地位的重塑时期（1982—2019年）。1982年，阿根廷同英国因马岛主权争端爆发战争，但阿根廷战败，军政府倒台。1983年，阿方辛政府上台执政，恢复并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梅内姆总统自1989年起连续执政十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阿根廷经济一度有较大发展。

① 徐文渊、陈舜英、刘德著：《阿根廷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② [美]乔纳森·C. 布朗著，左晓园译：《阿根廷》，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70—171页。

③ 徐文渊、陈舜英、刘德著：《阿根廷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84页。

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2003年，基什内尔就任总统后，阿根廷经济快速复苏，政局稳定，民生改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回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加快以及中产阶级规模扩大等因素，受外部需求拉动，阿根廷农业繁荣再次迎来新机遇。阿根廷是全球最富有农牧业产能扩张潜力的国家之一，对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供求关系、贸易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2012年间，受益于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阿根廷经济保持多年增长，但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开放度不高，产业链未能融入全球价值链，严重拖累了该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阿根廷作为全球重要的玉米、大豆、牛肉出口国，农牧业出口额约占该国外贸收入一半以上。这一阶段，阿根廷农牧业出口逐渐转向中国、印度、越南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2013—2014年间，随着大宗商品贸易黄金期终止，阿根廷经济再度陷入低谷。2015年马克里政府上台后，对内推行渐进式改革，对外主张以“实用、智慧和平衡”的外交政策融入世界^①，希望振兴阿根廷农业大国地位，同时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提升产业竞争力。但由于沉痾难除，加之2018年以来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改革遭受严重挫折，经济发展再度陷入衰退。

四 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原因：公共产品博弈困境

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爆发的数十年时间是阿根廷经济发展史上的“美好时代”，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阿根廷逐渐沦落为一个“衰败国家”，到21世纪初更是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②。尽管阿根廷从何时陷入衰退存在学术争议，但普遍性的共识是，阿根廷从一个依靠大宗农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而获得中等强国地位的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的发展困境。弱政体的制度是非凝聚性的，如果一个国家落入这种国家能力陷阱，会严重限制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③从公共产品博

^①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 de la Republica Argentina, *INFORME DE GESTIÓN: Política Exterior 2015–2019*, Buenos Aires, Diciembre 2019, p. 1.

^② 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143–151页。

^③ [英]蒂莫西·贝斯利、[瑞典]托斯腾·佩尔森著，付敏杰译：《繁荣的支柱：发展集群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弈角度看，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历史教训主要体现在政治、金融、产业转型、外交等功能领域的公共产品供应困境。

第一，政治稳定类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共产品，如何获得这类公共产品是长期伴随阿根廷国家构建和能力建设的难题。阿根廷独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充斥着联邦派与集权派、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其他省份之间的纷争，以及动荡、分裂、独裁与外部势力的渗透^①。阿根廷面临着国家构建中的主体性这一历史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塑造国家身份的价值观、符号，以及提供规范、制度等公共产品。作为移民国家，阿根廷有兼容、开放、包容的一面，也有内在的多样性甚至分裂、断裂性特征，社会凝聚力不足。阿根廷农牧业出口部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民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尤其是刺激了诸如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出口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等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先前已存在的经济活动完全隶属于地方资产阶级和生产率低下的大庄园主等农业出口集团^②。阿根廷存在两个强大的、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爆发前后，随着大宗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发展而崛起的出口利益集团，另一个则是兴起于1916—1930年间激进公民联盟政府时期并在庇隆政府时期（1946—1955年）获得快速发展的工会力量。这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角力、彼此争斗，造成了阿根廷政治、社会的分裂性^③。此后阿根廷政治不断在“民粹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的力量格局中轮替，呈现政治钟摆的周期性特征。1930—1983年间，阿根廷政治摇摆于军事独裁政权、民粹—职团主义政权、有限民主政权三种政体类型，经历了六次重大军事政变以及无数的小型军事政变，更换了25位总统。^④在上述背景下，阿根廷形成了民粹主义的政治传统，政府为获得政治支持而追求高福利政策，实行超越发展阶段的福利赶超。一旦大宗产品周期结束，财政政策难以为继，赤字及债务压力陡升，国家便陷入经济或政治危机，或者说公共产品博弈陷

^① 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142—145页。

^② [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恩佐·法勒托著，单楚译：《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4—40页。

^③ 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146—149页。

^④ Carlos H. Waisman, et al.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89, pp. 61—65.

入困局。一般而言，弱政体的执政期限较短，不愿为生产性公共产品投资，从而降低了未来的财政能力。^① 阿根廷在公共政策的关键领域总是会做出突然变化，从外交到教育、医疗等领域政策莫不如此，政策缺乏连续性^②。关于1955—2018年间阿根廷经济政策调整的研究显示，其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经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钟摆现象”。^③ 从1862年至今，阿根廷经历了六个钟摆式发展阶段，政治和经济的“钟摆效应”长期制约阿根廷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频繁的政治动荡使曾经的“世界粮仓和肉库”逐渐沦为“衰败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本^④。

第二，货币、金融稳定类公共产品短缺。阿根廷财权、币权统一的进程时至今日仍有路径依赖产生的制度性影响。独立初期，阿根廷境内使用的是西班牙各个王朝铸造的金币、银币和铜币，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省份也先后发行货币。1872年，阿根廷首次发行全国通用的本国货币，但各省货币继续流通使用。1875年，阿根廷以金本位制统一全国币值；1881年同时发行金比索和银比索，1883年将金比索命名为“国家货币比索”，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流通货币。^⑤ 直至1880年以前，阿根廷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货币，跨省支付需要货币兑换。^⑥ 阿根廷的兴衰伴随着多轮国际体系转型和权力转移，英国和美国都曾对阿根廷央行制度进行渗透和外交争夺。卡尔·波兰尼指出，英国发明了金本位制，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更多时候是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曲线来实现的。^⑦ 南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使其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⑧。美国的资本家羡慕英、德两国的资本家，他们曾抱怨，在拉美，5家英国银行有70个分行，5家德国银行有40个分行，1890—

① Daron Acemoglu,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2, Issue 7, 2005, pp. 1199–1226.

② [阿根廷] 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著，候健、张琼译：《阿根廷迷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1页。

③ Valeria Arza and Wendy Brau, “El Péndulo en Números: Un Análisis Cuantitativo de los Vaivene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en Argentina entre 1955 y 2018”,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61, No. 233, 2021, pp. 1–29.

④ 戴长征：《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现实状况与模式：基于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载《人民论坛》2023年3月20日第2版。

⑤ 徐文渊、陈舜英、刘德著：《阿根廷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2页。

⑥ 李春晖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73页。

⑦ [英] 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2–15页。

⑧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8页。

1915年间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投资约40亿美元，从而支配了这3个国家全部贸易的46%^①。“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创立的国际金本位制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崛起提供了流动性公共产品。但是，阿根廷严重依赖英国，允许黄金流动决定其货币价格，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银行加以管理，也就无法防范英国利率变化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②。英国利率的提高或流向边缘地区新贷款的减少，都会严重影响英国及其依附国家的资本流动乃至收支平衡状况。英国常常将其货币政策调整的负担转嫁给依赖对英贸易的阿根廷等边缘国家，并强化对这种不对称依赖关系的管控。20世纪30年代中期，阿根廷成立了中央银行，得到英格兰银行专家的帮助。尽管当时美元在强势崛起，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等国仍参与了英镑集团^③。1955年底隆政府垮台后，阿根廷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也由此逐渐进入美元体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一直是美联储重点分析对象^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72年10月，美联储对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四国调研评估认为，阿根廷的经济稳定计划陷入困境，且同IMF的关系陷入紧张；IMF对阿根廷的融资需求持消极态度，阿根廷国内也有呼吁退出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声音^⑤。豪斯曼等学者提出了“原罪论”，指一国不能以本币在海外借款或融资^⑥，“原罪”不仅产生货币错配风险，且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和信誉也受到极大限制。阿根廷占比过高的美元债务使得阿根廷长期陷入流动性供给不足困境，引发国际收支、财政甚至货币等领域的多重危机。事实上，阿根廷百年兴衰史深受债务危机困扰，自独立以来多次爆发系统性债务危机并波及国际金融市场，如1890年的巴林银行危机，1956年阿根廷同欧洲的主权债务谈判催生了巴黎债务俱乐部的诞生。阿根廷因货币、金融稳定类公共产品短缺，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0页。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69页。

③ [英]阿·尔·康南：《英镑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页。

④ Luis I. Jácome and Samuel Pienknagura,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Inflation in Latin America –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y”, in *IMF Working Paper*, No. WP/22/186, September 2022, p. 13.

⑤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Report of Latin American Trip*, October 12, 1972, Authorized for public release by the FOMC Secretariat on August 21, 2020, pp. 5-8.

⑥ Barry Eichengreen, Ricardo Hausmann, and Ugo Panizza, “Currency Mismatches, Debt Intolerance and Original Sin: Why They Are not the Same and Why It Matters”, i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036, October 2003.

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频发，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弱。主权债务已成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枷锁，亦是影响该国政治经济安全及外交自主性的重大隐患。

第三，长期依赖资源租金抑制了产业创新能力。阿根廷农牧业百年兴衰发展史，折射出农牧业一直是阿根廷国民经济命脉，对其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外交战略、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刻影响。农牧业是阿根廷财富的主要贡献部门，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依托，为该国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债务滚动等提供了资源租金。阿根廷有两大获得非正常租金的来源渠道，首先是依赖自然资源租金支撑了阿根廷从独立到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其次是寡头垄断产生的准租金，主要是“共谋实践”如关税、配额、特许等由政府授予某些公司或行业的特殊权利，导致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不能带来技术创新的租金。对此，熊彼特创新性增长比马歇尔产业发展的外部性更具解释力，也就是说，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阿根廷已跨越了依赖资源租金的第一发展阶段，以及依赖工业保护性增长的准租金阶段，但却一直没有发展到依赖技术创新为租金的经济增长阶段^①。据世界银行测算，受技术创新不足及参与全球价值链有限等因素影响，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采用增长模型计算发现，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是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②。测算阿根廷1980—2009年间的出口多样化及产品复杂性指数发现，产品复杂性对阿根廷人均GDP贡献率不高，通过比较优势演化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并未充分形成^③。专门生产复杂产品的国家通常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将经济复杂性指数（ECI）作为衡量创新的一个指标，可发现2008年阿根廷该指数为0.106，在全球和拉美地区排名分别居第57位、第7位，低于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全球排名；在1964—2008年期间，阿根廷经济复杂性指数在全球及拉美地区排名均出现了下降趋势^④。

第四，阿根廷对外战略调整与国际公共产品博弈困境。回顾历史，在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关键节点上，阿根廷的政治精英一直面临着应对国际体系转

^① Guido Di Tella and D. C. M. Pla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1880 - 194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86, p. 121.

^② 高庆波、芦思姮：《阿根廷经济迷局：增长要素与制度之失——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探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第86-100页。

^③ 伍业君、张其仔：《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阿根廷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第37-46页。

^④ Ricardo Hausmann, et al.,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New Hampshire: Puritan Press, 2011, pp. 64-66.

型和大国战略竞争的难题，特别是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阿根廷虽有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政治意愿，但因国家能力不足，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难以应对不同时段的外部冲击，结果长期依赖霸权国在对外贸易、汇率制度、债务融资等功能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但这种不对称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严重制约了阿根廷的战略自主性。阿根廷曾作为新兴国家崛起，深深地嵌于国际体系演变之中，其国家身份的塑造是内生性力量和外源性力量互动的结果，其中，在公共产品供需机制方面一直面临着路径依赖、对外战略调整压力以及国内政治协调等多种困境。历史上由于英国对阿根廷经济的主宰，阿根廷也因此被称为“不列颠帝国的第六自治领”，英国的金融资本及外交界同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人有着紧密联系^①。一战期间，阿根廷虽奉行中立政策，却同德国保持了密切关系^②。一战后，阿根廷与英国、美国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三角关系，至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对阿根廷的投资超过了英国^③。为应对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英国在联邦内部实行贸易特惠政策，严重影响了阿根廷农产品的出口。为保住在英国的市场，阿根廷与英国签署了《罗加—朗西曼协定》，承诺对英国商品实行进口优惠待遇，并且保护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安全。作为泛美体系中的中等强国，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阿根廷却奉行了反美政策，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针对美国限制阿根廷粮食和羊毛等商品进口的做法而采取报复性关税政策。面对美国新霸权的崛起，阿根廷对英国霸权的屈从政策并未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如《罗加—朗西曼协定》就是一个历史性错误^④。二战爆发后，阿根廷仍声称坚持中立政策，直到最后才宣布同轴心国断交。冷战期间，阿根廷外交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平衡，庇隆政府面对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坚持“第三立场”，同时抵制美国在拉美的霸权。20 世纪 90 年代梅内姆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抛弃民族主义、不结盟和“第三立场”原则，遵循“外围现实主义”的理论，奉行同美国结盟政策^⑤。然而，2001 年年底阿根廷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美国对其金融援助并不积极。阿根廷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98 页。

② Joseph B. Lockey, “The Meaning of Pan - Americanism”,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 1, 1925, pp. 104 - 117.

③ Pablo A. Baisotti, *A New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in Moder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August 2021.

④ Alejandro Vanoli, “Estado de la Guerra Hegemónica entre EEUU y China”, 28 de abril 2024. <https://www.ambito.com/opiniones/estado-la-guerra-hegemonica-eeuu-y-china-n5989298>. [2024 - 05 - 22]

⑤ 孙若彦著：《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25 页。

的兴衰面临着多个重要历史关头，由于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判断失误，其外交战略调整未能充分有效地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目标。

五 结论

本文尝试运用公共产品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结合功能主义和角色理论，对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尝试使用强互惠者角色概念，从微观、中观及宏观角度分析阿根廷发展进程中的公共产品博弈困局或失败情景，以揭示“阿根廷之谜”的学理与历史逻辑。从公共产品博弈角度看，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的历史教训主要体现在政治、金融、产业转型、外交等功能领域的公共产品供应困境方面。奥尔森命题对此有着较强的解释力，表明阿根廷兴衰的背后是“制度规锁”或“制度僵化”，或者说是“制度悖论”造成的结果。本文分析了阿根廷提供国内外公共产品的能力、影响以及制约因素，以此总结阿根廷中等强国兴衰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特点，但论证分析过程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一些观点和分析存在碎片化问题，需要更为严谨、系统的学术论证，特别是在使用强互惠者角色分析阿根廷国内外公共产品供需机制方面尚未充分展开。

阿根廷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全球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之一，也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重要的国际和地区影响。阿根廷地缘区位优势突出，国土面积居全球第八，腹地纵深广阔、海岸线长，陆地和海洋辐射能力强。从地区范围看，阿根廷在南美具有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阿根廷作为中等强国的百年兴衰史深深地嵌于世界体系和地区结构的复杂演化进程中。正如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从狭隘地专注于“国家体系”转向更加包容的“世界历史体系”分析^①，对“阿根廷之谜”的研究同样需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可见，不宜孤立地看待阿根廷兴衰这一国别现象，需要有相应的国别史观和世界史观，这同近年来拉美学界反思的“国家逻辑”问题相一致；与此同时，也不能仅仅从阿根廷内部因素解释其兴衰现象，还需要从阿根廷同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互动网络中加以探讨。阿根廷作为中等强国的历史地位出现了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发展潜力以及国际和地区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 高 涵）

^① [美] 瑟夫·拉彼德、[德] 弗里德里希·克拉著，金焯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